

第一章 土家族文化的生成机制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的有机组合便构成该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这种生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进程。笔者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应当从该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族源、人文生态三方面来加以考察。其中地理环境是民族文化生长的基本条件；族源决定该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人文生态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三者相互作用，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发生重要影响。对土家族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考察，也必须观照以上诸因素。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居住地区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地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环境。包括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及其他有机物质。二是人类生活的无机环境。包括生态系统的

气候、土壤、无机物质、地形、纬度、海拔高度等等。无机环境还包括地质环境和星际环境。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都是在这两大部分环境要素中进行的。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人类本身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生活资料取之于自然，劳动对象也是自然，此外，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以及政治、军事活动，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交关联。

关于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文化地理学派有详细的介说（当然，文化地理学派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是错误的）经典作家也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论及古代亚细亚和日耳曼不同的原始关系时指出，这种区别“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的变动。”^①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思维特征、审美情趣等等都与地理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考察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必须注意对其地理环境的考察。

土家族地区属我国南部山区，这里崇山环绕，河流纵横，森林密布，物产丰饶。这种地理环境对土家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下面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一）地理位置

土家族生活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这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有如下特点：

（1）全国中心地带。土家族地区处全国中心位置，其北部是河南、陕西、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是湖南、广西、广东，东部是鄂东、湖南、安徽、江西、福建、浙江，西部是四川、甘肃、西藏自治区。它距中国东西南北距离基本相等。与壮、维吾尔、蒙古、藏、苗等少数民

族相比，它不处祖国边缘，不与国外接界，是中国唯一一个人口逾百万而又不跨境的少数民族。

(2)古代中原与西南之间的通道。在中国古代，中原进入西南、西南进入中原的道路都必须经过土家族地区。中原进入西南的道路具体有三：一是经土家族地区过贵州，进入西南；二是从土家族地区经过湖南进入西南；三是通过土家族地区经过四川进入西南。同样，西南地区各族进入中原也要经过土家族地区。此外，土家族地区也是西北各族进入中原、东南、南方的一条捷径。史载“土家族地区‘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僚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②如蒙古贵族统一全国时，曾绕道四川、攻取襄阳，经过土家族地区北部而进入湖广、华南、华东地区。正因为土家族地区是西北进入东南的捷径，为防蒙古兵南下，宋代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布重兵防御。对此，史籍有明确记载：“宋末蒙古搭海入蜀，荆湖帅孟珙遣兵屯施州以备之。又蒙古兵渡万州湖（万州今四川万县）施、夔震动，盖施、夔表里大江，而清江源出彭水，中贯卫境，至夷陵宜都而合大江，其取势又捷也。”^③

(3)长江经过之区。长江是古代中国交通大动脉，同时又是古代中国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华西、华中、华东三区域文化通过长江互相流通，长江沿线各族各地区通过它而不断进行着文化交流。长江穿过土家族北部地区，土家族地区的众多河流也与长江相通。土家族地区的众多小溪多注入清江、酉水、乌江、武水、溇水，而乌江、清江直接流进长江；酉水、溇水、武水通过沅江而注入长江。土家族地区通过长江使自己同其他地区得以沟通，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这种态势对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4)与汉族地区直接相交、与中原相邻。土家族地区三面与汉族地区交界，东部与湖南沅、辰、常等汉族地区相接，南部与湖南沙、衡阳相邻，北部与河南、陕西汉族地区接壤，只有其西部同西南各少数民族相交。与此同时，土家族地区同中原相距甚近，这种地

地理位置对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十分有利。

土家族所处的上述地理位置，对其文化发展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便捷而频繁。

一方面，由于土家族与汉族地区直接交界，也就是说土家族文化区和汉族文化区是直接相连的两个文化区。根据文化学理论，相邻的文化区文化最容易发生流动。这就决定了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容易发生交流，彼此文化交流的强度大。作为一种高势能的文化，汉族文化总是流向土家族地区（当然土家族文化也流向汉族地区）。由于两地区相距较近，从汉族地区发出的文化信息能够较快地到达土家族地区并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信息损耗小，变异要素少。这也是土家族能够较早较多地接受汉文化并失去其民族部分特征的原因之一。与土家族相比，那些与汉文化圈不直接相接的少数民族同汉族文化交流强度要弱一些，汉族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较那些与汉文化圈不直接相接的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要大些。

另一方面，由于土家族地区是中原与西南联系的通道，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相互往来，要经过土家族地区；文化交流通道——长江又穿过土家族地区，这也使得土家族文化有更多的机会同汉族文化交流。

第二，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流频繁。

由于土家族地区是西南进入中原的通道，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发生联系时都经过土家族地区，这也使得土家族有较多机会同西南各族发生关联，有利于土家族文化与西南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

（二）气候

气候对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气候状况对民族性格、审美情趣、文艺风格等都有一定影响。如有人认为，印度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炎土文化，其哲学、艺术、文学等等都有炎热气候的

明显痕迹。当然，夸大气候对文化的作用是错误的，但忽视气候对文化的影响也是不科学的。

土家族地区有其独特的气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土家族地区气候稍有差异。

土家族地区远古气候。今土家族地区在远古时代的气候状况，目前还没有详实的直接资料。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决定着不同的植物群落与生物群体，我们可以通过对动物和植物群落的分析来推断当时的气候情况。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发现了南方古猿、巨猿、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建始高坪巨猿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考古发现来了解远古时代土家族地区的气候情况。

建始高坪巨猿洞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发现和发掘的。共得到各类动物化石 20 多种，主要有南方古猿、巨猿、大熊猫、剑齿象、桑氏鬣狗、犀牛等。这一动物群体绝大多数动物属东洋区系的华南类型。其中象、犀牛、獐的现生种主要生活在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南部地区以及非洲和中南美洲的低纬度地区，现生鬣狗生活于热带非洲，而化石大熊猫主要发现于温暖的南方。南方古猿的化石，主要在非洲以及中国，在中高纬度地区绝少，巨猿化石仅见于印度和中国的南部地区，如广西和湖北以及处湖北边缘的巫山。而现生的高等灵长类也大多生活于热带地区，这些动物如大象、犀牛和獐动物，习惯活动于常绿阔叶的热带森林沼泽中，马、羊类草食动物习惯生活在山间草地和平草甸，牛、鹿、虎等则喜欢居于多水的丛林和疏林，豪猪、獾多喜欢在湿润的山间丘陵，大熊猫则生活在茂密的山间竹丛之中，而食肉类的剑齿虎、古豺等喜欢生活在丛林中。

我们今天从这些动物的习性去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土家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大致如此：森林、疏林、草地和竹丛密布，水源充沛，气温与今天大体相当。在地质条件下则形成了山川平原；在气候条件下，又会形成各不相同的植被、植物群种。这又形成了适宜

于这类条件的生物群种，以利用其自然界给予的条件。^④

土家族地区远古气候的状况与特点从高坪巨猿洞内的地层堆积中也可得到反映。

高坪巨猿洞共有 16 个自然层位，从中可大体看出土家族地区远古气候的规律与特点。

第一阶段为第 1 层。堆积物为粉砂质土，颜色为微红棕色，说明在沉积过程中，氧化条件较强，沉积物中含有大量的铁质氧化物和游离的腐殖酸的氢氧化物。因其颜色非常紫红，而颗粒又为粉砂质，故推断当时应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热带——亚热带的南缘气候，与之伴生的植物应是一种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森林为主的自然景观。

第二阶段为 2—13 层。基本上是棕黄色砂质土和黄色钙结层交替堆积，棕黄色砂质土所代表的是一种湿热的亚热带气候。而黄色钙结层属黄土类堆积，所代表的仍然是一种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与之伴生的应是一种以暖温带的阔叶常绿——落叶常绿的亚热带森林为主的自然景观。这一阶段的气候虽然无大的变化，小变化是存在的，与第一阶段相比，湿、温度有所下降，而且是轮回式的脉变，但整个变化未超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

第三阶段为 14 层。以紫红色粘土为代表的热带雨林气候。说明当时温度高 雨水充沛 氧化条件强烈 风化作用彻底 使沉积物中的颗粒形成细粘土。表明此间的热带植被群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第四阶段为 15、16 层。两层为棕黄色亚粘土和碳酸钙胶结物质层。在经过较短时期的热带气候变化之后，温度有明显下降，形成了钙质胶结层。但从棕黄色亚粘土来看，它所代表的气候应比第二阶段高，可能接近于湿热的南缘亚热带气候。其植被应与第二阶段大致接近。

巨猿洞中的堆积 大致经历 4 次大的气候波动和 16 次小的

气候脉变，呈现的是周期性变化。总的说来，是以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为主。气候、植被、动物群体的组合表现了当时土家族地区的生态景观。^⑤

近现代气候。近代至今土家族地区气候变化不大，总体上说土家族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温湿多雨，水热同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丰沛，四季温和。年均气温在 $12^{\circ}\text{C} \sim 17^{\circ}\text{C}$ ，年降水量为 1100—1600 毫米，无霜期为 190—280 天。雾多湿重，风速小，日照充分，年均均为 1200—1500 小时。但由于属山地，高山和平地间气候的垂直差异明显：山下是亚热带气候，山腰是温带气候，山顶则是亚寒带气候，不同的海拔地带气候情况不一。

海拔 350 米以下的河谷地带，常年湿润，气温较高，年均气温为 17°C ，无霜期为 280 天以上，年降水量为 1300 毫米。本地带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一年三熟，适宜甜橙、夏橙、柑桔、柚等水果生长。

海拔 350—700 米之间的低山地带，冬季温暖，年均气温为 $15^{\circ}\text{C} \sim 17^{\circ}\text{C}$ ，无霜期为 260 天以上，年降水量为 1300—1400 毫米。本地带农作物，一年两熟，适宜温州蜜桔、油桐、油茶等经济林木生长。

海拔 700—1300 米的二高山地带，年均气温在 $11.5^{\circ}\text{C} \sim 15^{\circ}\text{C}$ 之间，无霜期为 220 天以上，农作物一年一熟，旱作间套，适宜白肋烟、烤烟、茶叶、生漆、板栗等经济作物生长。

海拔在 1300—2000 米的高山地带，年均气温在 $6^{\circ}\text{C} \sim 11^{\circ}\text{C}$ 之间，无霜期为 195—220 天，年降水量为 1500—1600 毫米。粮食作物一年一熟，以玉米、洋芋、芸豆为主，适宜黄连、党参、当归等中药材以及油松、黄杉、巴山松生长。

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高山脊岭地带，年均气温在 6.5°C 以上，无霜期不足 195 天，年降水量为 1600 毫米，属宜林、宜牧地带，以寒温性针叶林等疏林灌木为主。

总的说来，土家族地区气候条件较好，具有多种气候带，适应

多种作物生长，为发展多种经济创造了条件。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受季风进退时间和强度不同的影响，土家族地区降水和气温差异较大，雨、洪涝、干旱、低温冷害、冰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较为频繁，对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影响。

对于土家族地区气候情况，不同时代的史籍中都有记载。《施南府志》载道：“山深林茂，入夏蒸湿颇甚，每遇炎暑，旦夕亦觉清凉，……隆冬积雪，至春夏交始尽”。

道光嘉庆《恩施县志》载：“地处万山中，每岁霖雨数月，春多温，四月后蒸湿亦甚。冬雪易消，冰不甚坚。外客至，不善调养则头痛。高山密箐，风气特紧。五月不异寒冬，晨起大雾，是日必大晴，四季皆然。其气多阴，又多暖。土多沙泥，春夏多雨。”

同治《来凤县志》言道：“邑处万山中，其气多暖，二月中，可单衣，可挥扇。入夏后，蒸湿特甚，衣物皆霉。五六月间，常雨雹，盖阴气暴上，胁阳而凝结也，俗呼雪子。夏秋之际，人多疟疾。十月始霜，积雪不盈尺。冬腊月，平地常闻雷声。”^⑤

对于高山与平地间区别，史籍也有记载。“隆冬可单，盛夏可夹”。“居高山者，寒多暑少，盛夏被不脱棉，晨夕必烘于炕，故收获较迟，一切蔬菜皆过时食始。山中侵晨，必有瘴气，非雾非云，弥漫山谷，开早则雨，开迟则晴，四季占之不爽。”^⑦

土家族地区气候状况对其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耕作制度上。不同地区耕作制度不一，高山地区，一年一季，开春晚，八月同隆冬，十月以后，人们在家闭门烤火。二高山地区两年三季，三月开春，人们从事生产，十一月后进入冬季。平坝地区则不同，一年两熟，条件好的地区一年三熟。对此，史书载道：“处深山穷谷之中，气候与他处异，一邑之中亦各有不同。”^⑧“地之高下不齐，气候各异，山诸处最高者，四时多岚气漫漫……九月积雪，积至春后始消，盛夏如秋冬，不去棉。秋后农功毕，各闭户取薪火，不轻出。春时乃作于外。”^⑨

《永顺府志》对本地区耕作制度也有描述：“山农种杂粮，于二三月间医薙草伐木，纵火焚之，冒雨锄土撒种，熟时摘穗而归，弃其总藁。种稻则五月插秧，八九月收获。山寒水冷，气候颇迟。”每家设火床，中置火炉以炊爨，日则男女环坐，夜则杂卧其间。^⑩

（三）地形与地貌

土家族地区地形及地貌有如下特点：

山峦重叠。土家族地区处在我国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 1000 米左右，海拔在 800 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 70%，境内峰岭重叠，岗峦密布。武陵山脉贯穿湖南的古丈、保靖、永顺、大庸和贵州的铜仁、印江等地；其支脉延伸到湖北的来凤、咸丰、宣恩、恩施、鹤峰和重庆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武陵山的主峰梵净山高 2494 米，是乌江、清江、酉水的分水岭。而巫山山脉穿插于恩施、建始县北部和巴东县中部。大娄山在渝东黔江地区展开，湖北利川齐跃山为其边缘山脉。其主要山脉有湘西北部的八公山、西部的八面山、西南的腊尔山，鄂西南的齐跃山、中部的椿木营、东北部的绿丛坡、五峰境内的摸天岭，渝东黔江的灰千梁子，四川盆地东南缘的大娄山等等。群峰矗峙，河谷深切，悬崖峭壁，是整个土家族地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之一。

河流纵横。土家族地区的大小河流数千条，著名的有清江、澧水、唐岩河、酉水、武水、乌江等河流水系。土家族地区河流流向不一，有的北注长江，有的南汇沅水，有的西入乌江，它们纵横环绕着土家族地区。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小溪还是大河，最后都注入长江。清江、乌江直接流入长江，酉水、澧水、武水注入沅水后，流入长江。

地貌多样。土家族地区有多种地形，既有山地又有河谷、高原、平坝。

山地又分为高山、二高山、低山。高山海拔在 1500 米以上，如齐岳山、梵净山、千丈岩等等。二高山海拔在 800 米以上，其面积

较为广大。海拔 800 米以下的低山在土家族地区占不少面积。

河谷多在两山之间，主要河谷有酉水河谷、清江河谷等。

盆地分布在一些低山之间。主要有恩施盆地、建始盆地、来凤与龙山盆地、召市盆地、廖家村盆地、万坪盆地、甘溪盆地、秀山盆地等。这些数十个大小不一的盆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土家族地区自然环境最好的地区。

另外，受第四季冰川的影响，该地区石灰岩地形发达，有众多的石灰岩溶洞，利川的滕龙洞、咸丰的黄金洞、来凤的卯洞是其中的代表。

土家族地区上述地形与地貌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如下：

(1) 山区地理环境造成土家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相对隔绝，影响汉文化传播。土家族地区虽然与中原地区相距不远，但由于属于山区，境内崇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本地人出山不易，外地人进山也难，这严重影响文化传播。文化社会学认为，两个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传递不仅与彼此间的距离有关，同时也与它们之间的地形地貌状况有关。在距离相同的情况下，地势平坦的文化区容易接受从文化源发出的信息，从文化源发出的信息到达目的地时间快、信息损耗少。而地理条件复杂的文化区在接受文化源发出的信息时，不如前者快，并且文化信息的损耗也大。土家族地区虽然离中原汉族文化区近，但其多山的环境削弱了汉文化传播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土家族与汉族文化接触早、交流频繁，而又能够保持其部分特色，未全被汉化的原因之一。

土家族“处万山中”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对其统治政策。关于这一点，古代学者也有认识。清代学者顾彩到容美土家族地区，看到土家族多山的环境后，认为，土家族地区距汉族地区并不遥远，中央政府长期不对其进行直接管理而实施土司制度，就是因为重山的阻隔。“容美在荆州西南万山中，…草昧险阻之区也。……在汉、晋、唐皆为武陵蛮。武陵地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

中多述津。…入其中者，不辨东西南北。…道路险侧，不可以通舟车。…其险处，一夫当关，万人莫入，宜乎自古迄今，不能改土而设流也。假若官辙可至，宁肯举腹里之地，弃同荒徼哉？^⑪

(2) 土家族地区所处的山地环境决定了土家族文化属于山地农耕文化类型。土家族地区是山区，土家民族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但土家族的农耕文化与中原汉族地区的农耕文化有区别。汉族地区的农业是灌溉农业，其农耕文化是稻作文化，土家族地区的农业是以旱粮作物为主的农业，其农耕文化与中原汉族地区有别，它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以旱粮作物为主。土家族地区山多田少，加之地多陡坡，蓄水不易，“晴久则虑其旱”。水稻种植规模不大，适宜旱地生长的作物多。史载：“高山峻岭上，种荞麦、豆、粟等杂粮。阴雨过多，多崩塌。水田甚少，有所谓旱稻者，米性坚硬，不及水稻之滑腻，惟苞谷最盛，播不择地，不忌雨，但迎岁虫腐，不可久留。疾遍山，挖蕨作面，可备荒。”^⑫

二是农业经济结构中，养殖业占一定比例。土家族山区中，草场较多，适宜畜牧业发展。

(四) 植被和动物

土家族山区植被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数量大。

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以前，土家族地区植被丰富，林木葱郁。

《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广汉，有山林竹木之饶。”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生长着大量的楠木、白楠等珍奇树种，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改土归流后，尽管土家族地区土地垦殖空前，但其动植物资源仍然十分丰富。从文献记载的和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主要有象、猿、虎、狼、鹿、马、牛、狗、狸、龟、蛇、羊等等。如在湖北鹤峰州山羊隘地区：“……是时，人烟稀疏，上下一带居民不过一二十户。草木畅茂，荒郊旷野，道路俱系羊肠小径，崎岖多险，兽蹄鸟迹，交错于道。山则有熊、豕、鹿、麂、豺狼、虎、豹诸兽，成群结队，或若其性。

水则有双鳞石鲫、重唇诸色之鱼，举网即得，其味脆美。时而持枪入山，则兽物在所必获；时而持钩入河，则水族终至盈筭，食品之嘉虽山珍海肴、龙脑凤髓不有能出其右者。其间小鸟若竹鸡、白雉鸡、野鸡、凤凰、锦鸡、上宿鸡、土香鸡，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慨。^⑬溪州竹枝词：“溪州之地黄羊多，三十五藏岩窝，春种秋熟都窃食，只怕土人鸣大锣。”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的建设，今天土家族地区仍然有众多的动植物。葛洲坝建设之初，曾在长江河床底，发现有六七千年前的大树被深埋。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今恩施土家族地区有林面积为 1090.7 万亩，活立木蓄量为 1835.7 万立方米，人均有林面积 4 亩，人均活立木蓄量为 5.4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39.3%，这些指标均高于湖北省及全国同项指标。土家族地区林种丰富，如恩施州有树种 171 科、60 属、1264 种，其中经济价值较大的林木有杉木、楠木、泡桐、油桐、油茶等 300 多种，珍稀树种有银杏、水杉、珙桐等 60 多种。

土家山区盛产药材，中药材资源丰富，有“华中药库”之称。如恩施自治州有药用植物 168 科、854 属、2088 种，占全国已发现药材的 46%；其中已收购品种为 282 个，占全国已收购品种的 40%，大面积种植的有鸡爪黄连、板桥党参、紫油厚朴、当归、杜仲等 20 多个品种，其中黄连、贝母收购量居全国第二，厚朴产量占全国的 85.3%。有的药材，如绞股兰、头顶一颗珠等对癌症有一定疗效，引起医药界的极大重视。

土家族地区野生动物繁多，并且分布广、经济价值高。其中仅恩施州被列为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有 23 种，占湖北省的 64%。野生毛皮类动物 60 多种，药用动物 60 多种。

土家族地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对其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形式上。它使土家族人的经济生活多样化，除农耕经济外，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也是其经济生活的重要形式。

(1)采集经济。由于土家族地区植被丰富，不少植物可以食用；有些植物虽然不能食用，但可以作为药用或其他之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土家人常上山采集植物，或直接食用，或作为商品出售，换取所需物品。

(2)渔猎经济。由于动物资源丰富，人们“时而持枪入山，则兽物在所必获；时而持钩入河，则水族终至盈筥”。^⑭不少人以渔猎为生。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生活方式以农耕为主，但渔猎生产依然存在。“设县初，山深林密，獐、麂、兔、鹿之类甚多，各保皆有猎户。”^⑮

二、族源及先民文化

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只起基础作用，它只能派生出一部分文化要素，只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选择。至于民族文化的本质要素则与其族源和先民文化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察一个民族的族源及其先民文化对于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有特殊意义。

关于土家族的族源，以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即“巴人说”；二是认为土家族是以古代土著居民为主融合后来进入该地区的巴人、汉人而形成的，即“土著说”；三是认为土家族是以由贵州迁入的乌蛮为主融合土著人、巴人而形成的即“乌蛮说”。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土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它是古代巴人的一支融合当地土著和进入这一地区的汉人、濮人、楚人、乌蛮等部族在唐末五代而形成的。研究土家族文化的生成机制，必须对上述部族文化及其与土家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巴文化的影响

1. 土家族地区巴人活动及巴文化情况

据研究 巴人是氏羌人的后裔。《山海经》载道：“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 咸鸟生后照 后照始为巴人……”。可见 巴人最先生活于西北地区，后来由陕西、河南进入湖北、四川。巴人南迁后进入今土家族地区。对此，考古发掘和史籍都可证明。考古工作者在当今天家族聚居的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发现了一种属于新石器的风格独特的地域性文化，^⑩其时代相当于夏商时期，学者们称这种文化为“早期巴文化”。其后续文化也在土家族地区得到发现 时代相当于东周时期 学术界称之为“春秋战国巴文化”。这种巴文化在今土家族聚居区域内，出现时间最早，继承性、稳定性强，延续的时间长，覆盖面大，其文化特征为后来土家族文化较多地保留。

“早期巴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江边地势较低处。房屋遗迹较少，并较简单，这可能与巴人常在水上生活有关。墓葬为长方形土坑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石器磨制不够精，多保留有打制痕迹。用于砍削的大型工具较多，特别流行蚌壳形石片，是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刮削器。此外，还有斧、锛、凿、砭等。陶器是最重要的遗物，一般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手制陶占较大比例。基本器型有罐、甑、豆、盂、杯、盥、器盖、缸、器座等。以圆底罐为基本炊器是早期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毛或刮鱼鳞用，其主要食物当是野生动物或鱼类，证明早期巴人的经济是以渔猎为主。

史籍中对于巴人在今土家族地区的活动情况也有记载。《山海经》记载了一些巴人在今三峡地区活动的传说。据说在巫山以西有黄岛、黄鸟于巫山 掌管玄蛇。“黄鸟”、“玄蛇”显然代表古代不同图腾的部落。相传早期巴人曾以蛇为图腾。“巴蛇食象”的传说曾经出现在洞庭湖畔的岳阳一带。又据说，在秭归以西的大江

之南有一个称为“巴”的古老部落。夏启之臣孟涂，曾在“巴”主管神道，巴人求神于孟涂。孟涂发现巴人衣上有血者，就逮捕起来，用以祀神。

《世本》对巴人的一支——廪君巴人的情况有说明：“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即是说“廪君”的祖先，出自“巫诞”这个古老部落。邓少琴认为这个“巫诞”即是《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巫蜃民”。^③其地约在瞿塘峡东口（大溪口）至巫峡西口（巫溪口）之间。因此，从考古文化和古老传说来看，说明在现今土家族聚居地域内，存在过早期巴文化和古老的巴族。

巴人进入峡江地区后，其势力得到发展。对此，《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较详：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𢇛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擲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命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对于春秋战国以来巴人的活动情况，考古学界也有发现。在重庆的巴县、昭化、涪陵发现了巴人墓葬群，渝东的其他地区发现巴人遗物也不少。在湖北的巴东、秭归、长阳、建始、恩施、利川、江陵、枝江、当阳、襄阳等县发现了巴人遗物或墓葬；在湖南的石门、龙山、吉首、大庸、古丈、花垣、凤凰、保靖、芷江、泸溪等县发现了主要属于窖藏的巴人青铜器，溆浦等地发现了多处巴人墓葬；在贵州的松桃县发现了可能属于窖藏的巴人遗物。上述一些地区出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器物，如圆底陶罐、圆底铜釜以及器物组合，反映了东周以来的巴文化同“早期巴文化”的传承关系。

2. 巴文化的特征

巴人文化中较有特色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劲勇尚武。史籍称 廪君善于掷剑 能命中目标 巴师天性劲勇。巴人这种劲勇尚武的民族特性，表现在巴人墓葬及出土文物中 武器较多而且别具一格 以剑、钺、戈、矛、箭镞为主要武器。例如 在秭归向西地段的巴人墓葬中 生活器很少、兵器多 兵器有巴式柳叶剑、小型的圆刃束腰式钺、骹部带双耳的巴式矛，还有斧和缝上带勾的戈。有一墓葬死者身边，呈扇形排列箭镞 14 枚，当是巴人将士战死后将随身所携兵器和箭囊一起埋入地下。在巴东沿江的溪洞中，特别是汇入大江口的石隙中，能找到各式各样的青铜箭镞，有时能在一隙中获数百枚，在临江岩礁石隙里，常常能拾到十几斤、几十斤铜箭镞和断残兵器，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巴人与楚人弓矢相交乃至短兵格斗的激烈战斗的情景。由于巴人勇武善战 故多出将才。《华阳国志·巴志》引当时成语说“巴有将 蜀有相也”实有深刻的文化背景。

(2) 以虎为族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而曾经射杀“白虎”的“板楯蛮夷”也称“白虎复夷”。其后裔自称“白虎蛮”。说明巴人不仅崇拜虎 并以虎为族徽。在渝东、鄂西、湘西、黔东发现的从东周到秦汉时代的巴人青铜器物上，不管是兵器还是乐器，大都有虎的纹饰或图像。在巴式柳叶形剑的剑叶上，有虎斑形纹饰，在剑身近柄处，铸有虎纹、手心纹。在溆浦的战国巴人墓中出土了一件剑格上铸有人首双虎身图像的巴式剑。在巴式铜戈上，在援的后部有一凸起成浮雕状虎头纹饰，虎的形象瞪目咧嘴，双耳向后伸出，越栏以包戈秘，虎身则延伸至内上，用阴刻线条表示。在四川峨眉符溪出土的铜戈上，还铸有鲜明的以人祀虎的图像。虎钮 鐻于这种巴式乐器，在湖南石门新关的一个窖藏中就出土了 15 件，贵州松桃木树乡一次出土了大小排列成序的 5 件，四川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出土的虎钮 鐻于，与湖北长阳、湖南泸溪出土的

纽鐎于大体相同，在恩施自治州还出土了一件双虎纽鐎于。因此熊传新指出 湘、鄂、川、黔出土的这些以虎为饰的青铜器已超出了图案装饰的范围，具有图腾或族徽的特殊意义。

(3)锐气喜舞。据载 巴人曾随周武王伐纣“歌舞以凌”；又从汉高祖定三秦“前锋陷阵 锐气喜舞。”汪宁生结合云南德宏地区及四川凉山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存在过的古老战斗习俗，解释巴人“歌舞以凌”的所谓“歌”，就是高唱战歌或大声吼叫；所谓“舞”，不过是临阵时有人在前挥舞武器作出一种恫吓性动作而已。^⑬汉高祖对巴人的勇锐精神十分赞赏，数次观看巴人的这种歌舞 并令乐人模仿巴人“锐气喜舞”的动作 制作了巴渝舞。

(4)行船棺葬。传说：廪君能浮土舟，“板楯蛮”居于渝水两岸 到东汉时 江州县（今重庆）之民结舫水居 五百余家。说明巴人是长于舟楫和傍水而居的民族。船棺葬就是在巴人曾经居住过的巴县冬笋坝、昭化（今属广元）宝轮院先后发现的。这里多数墓葬都是以独木舟为葬具。船棺在葬式中的用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尸体和殉葬物直接置入船中；另一种是在船中另置一木制小棺以殓尸体及随身物品，陶器及铜器则置于棺外舱中。在随葬品中，青铜钺和巴式剑为主要武器，陶器的器型以圆底为多。船棺葬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此种葬具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作为葬具，表示人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或者表示巴人的祖先崇拜、千里归宗的信仰——即在人死了以后，利用船只、水道，把人的灵魂送回到想象中的故乡去。

(5)信鬼事道。史籍记载：“巴郡南郡蛮”（廪君之部）俱事鬼神，賁人（板楯蛮）俗好鬼巫。巫术是道术的一部分，以符咒为主要道术的“五斗米道”带有浓厚的巫术特色，道教的发展与巴蜀地区盛行巫术有着密切关系。东汉末，太平道首领张角被杀后，张修亦亡。旧史称五斗米道张修是“妖巫”是鬼主，实即巴郡土著夷